

## 貓族隱喻與都市生態\*

——以朱天心《獵人們》為中心

沈 玲 方環海

**提 要：**文章以朱天心的《獵人們》為核心考察文本，結合作家其他作品，運用文藝生態批評的方法，從芭芭拉·漢娜的心理學角度探討貓這類動物對朱天心的意義以及這些貓族生態的描寫如何影響了朱天心的生態認知，從而解讀貓族的隱喻含義，探討作者與自然生態系統中其他成員親密交往中的種種生態意識，以及朱天心的“老靈魂”們身上帶有的都市生態意識。貓族與人相互映照，貓族的獵人意識就是朱天心們在都市生態的映照，更是朱天心們內在心境與社會處境的隱喻投射。

**關鍵詞：**朱天心；貓；隱喻；無意識；都市生態；《獵人們》

### 一、貓族：作為“獵人”的生態無意識

根據芭芭拉·漢娜的考察與分析，貓是家畜中馴化程度最低的動物，與狗不同，貓對人敬而遠之，並不完全屈從於我們及不完全和我們生活在一起，與其說它維繫於人，遠不如說它維繫於其居住地。馬克·吐溫所言的“神造萬物，只有貓不能用鏈子奴役”<sup>①</sup>該是這種意思吧。因為那條無形的彈性的帶子，貓族是自己抓着自己掌控的，而狗由於馴化及它具有友好和忠

\* 方環海為本文通訊作者。本研究得到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生態文學作品中的環保思想及其現實價值研究”和廈門大學漢語國際推廣南方基地專項專案的資助，項目編號：08ZWD021，同時承蒙香港大學黎活仁教授慷慨提供研究資料上的便利，謹致謝忱。

① 錢永祥，〈序〉，《獵人們》（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15。

誠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把這條無形的彈性的帶子交到了主人的手上。

總體而言，貓族具有驚人的獨立性，而且還是殘忍狡詐的獵食性動物，這似乎顛覆了一直以來我們人類對貓的感知與認知。<sup>②</sup>許多情況下，貓在把活的獵物例如小魚小蝦小雞小鼠吃掉之前，還會先期進行把玩，這時候的貓族好像貓科大型食肉動物，如獅子、老虎、豹子之類的一個小號翻版。在漢娜的歸納中，貓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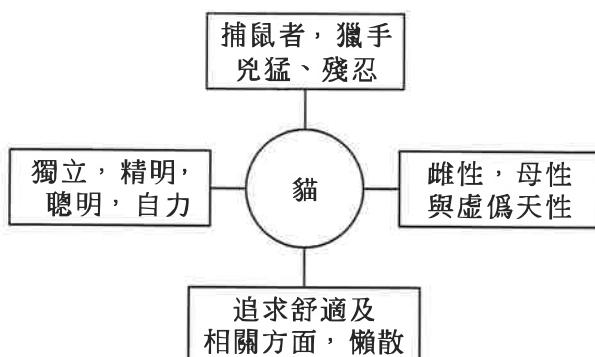


圖1：貓的各個方面（引自芭芭拉·漢娜，《貓、狗、馬》，頁116）

根據考察，貓絕對是動物世界裏最為極端的獵人，非常善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攻擊，也會出乎意料地進行突襲。本章主要以《獵人們》為考察中心，運用文藝生態批評的方法，從芭芭拉·漢娜的心理學理論角度探討貓族對朱天心的生態意義，解讀貓族的隱喻含義。

## 二、朱天心的生態位：“我”也是一隻貓

“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作為生態學中的一個術語，原是指生物所處的一定時空及其與其他生物種群的結構功能關係與作用，通俗點說，就是維持一個物種生存最低限度的生態結構和環境條件。<sup>③</sup>這是來自於結構主義觀點下的概念，結構主義認為，決定一個事物價值的，是結構關係，而不是其自身的價值。所有的生物自身都是居於一定的時間（歷時）和空間範圍

<sup>②</sup> [英]芭芭拉·漢娜(Barbara Hannah)，迪安·L·弗蘭茨編，劉國彬譯，《貓、狗、馬》(The Cat, Dog and Horse Lectures)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111。

<sup>③</sup> 魯福元，《生態文藝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04。

(共時)內，也都是處於一定的結構與功能關係體系裏，宛如一枚棋子，決定其價值的，不在於棋的質地如何，而在於它處於什麼位置，具有什麼樣的相對關係。對於一個作家的成長來說，其“生態位”即是“自然風物景觀、時代精神氛圍、社會政治狀況、文化傳統習俗以及基本的物質條件”<sup>④</sup>。

作為作家的朱天心“生態位”如何？是什麼促使她在文學世界裏恣意描畫那片動人的貓族風景？梳理朱天心的成長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家庭背景、居住地域及時代氛圍對作家身份的朱天心產生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具體而言，為父親、眷村、社會三個要素。

朱天心的生態位遇到了當年特殊環境下去臺灣的大陸人及其子女所面對的共同的尷尬。臺灣本土的原鄉人叫他們為“外省人”，到大陸後又被叫做“臺胞”，完全沒有了身份的歸屬感。

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來臺的軍人，母親劉慕沙則是臺灣苗栗客家人，作為外省人第二代，身份的曖昧、尷尬也會困擾着朱天心。“大概非眷村，或六十年代後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無法理解，很多眷村孩子，在他們二十歲出外讀大學或當兵之前，是沒有‘臺灣人’經驗的。”<sup>⑤</sup>

“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sup>⑥</sup>，故鄉在每一個第一代外省人的心上都烙下深深的火熱的烙印，返鄉的複國神話的破滅（1975年“蔣介石【1887-1975】消逝、神話信念崩潰”<sup>⑦</sup>）化為刻骨的相思，幾十年空間的阻隔在悄無聲息間無情地掠走了他們心靈的歸屬地，他們只能偷偷安放好讓他們心痛而越發清晰的鄉愁，在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感脅迫之下，努力調適無所歸依的焦慮、慌亂，接受現實，而海峽那端的故事到了子女們這兒則成了父母口中的失樂園。

朱天心這一代的鄉愁完全建立在第一代人身上，是一種缺少根基的鄉愁，她這個臺北的“異鄉人”穿梭於記憶與現實、現代都市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故鄉，並通過故鄉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揭露了建於廢墟上的現代都

<sup>④</sup> 魯福元，《生態文藝學》，210。

<sup>⑤</sup> 朱天心，〈采薇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228。

<sup>⑥</sup> 朱天心，〈采薇歌〉，219。

<sup>⑦</sup> 朱天心，〈采薇歌〉，230。

市存在着的自然與精神方面的生態危機。<sup>⑧</sup>因此，所謂的“回歸之旅”也染上了濃郁的生態學意味。文學世家的家庭氛圍，童年生境的眷村，給予朱天心這個擁有樸質真摯的自然觀和知識分子責任感的“老靈魂”棲於現代經濟全球化的都市中以無限的勇氣與慰藉，使這個擁有一顆悲天憫人善良之心的作家有了成為生態人的可能，靈魂深處的流浪註定她的角色與一隻流浪貓相似。

### 三、都市貓族的生存狀態

朱天心筆下的貓族生存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人在他們身上的投射。貓就是貓，引領他的，是他的自我天性。當今世界被視為“最有影響的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認為，最為重要的是人類要“把動物作為獨立的有情生命來看待，而不是把他們當做滿足人類目的的工具。”“我們所關注的是防止痛苦和悲慘境遇，反對專橫的歧視。”<sup>⑨</sup>

說及收養流浪貓的緣由，朱天心說：“與其說是因為喜歡而收養，不如說是因為同情，路邊牆角被丟棄的凍餓着的生命的恐懼張惶的眼神，永遠比任何抱在懷裏、收拾打扮得像填充玩具的寵物必然哐啷一聲擊動我心臟，腎上腺素急速升高，恨不能立即統統帶回家。”<sup>⑩</sup>“我害怕（不管是基於任何的考慮或主張或倫理）若自己一旦對日日觸目所及的弱小都不能感同其情，如何能對更遙遠更抽象的貧窮、饑餓、幼童能心動心軟並付諸行動？”<sup>⑪</sup>

人類和動物之間種種不和諧現象的形成是因為人類自我過度的需求和在自然中樹立主體中心地位的偏差而引起的，那麼應該如何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樹立和諧的生態中心主義呢？在這全新的生態關係中，人族又該承擔起怎樣的角色？

<sup>⑧</sup>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東華人文學報》3（2001），241-268；王班，〈呼喚靈韻的美學：朱天文小說中的商品與懷舊〉，收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0），343-359。

<sup>⑨</sup> 彼得·辛格，《動物解放》初版序，祖述憲譯（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2。

<sup>⑩</sup> 朱天心，《獵人們》（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49。

<sup>⑪</sup> 朱天心，《獵人們》，62-63。

### (一) 貓族的多樣生態

在《獵人們》一書的扉頁上，朱天心寫道：“本書寫給不喜歡貓和不了解貓的人”，“人貓各行其是，兩不相犯。”是她表現的境界。<sup>⑫</sup>“他們可以在人族佔盡資源佔盡優勢的生活環境中仍有一己的存活空間”<sup>⑬</sup>，對那群流離失所的貓咪——無論是殘疾的還是模樣醜陋的甚或奄奄一息的——朱天心都發自肺腑地給予關懷與尊重。這些城市流浪貓們在短暫的一生（生命常常只是兩三年時間）中“各逞其能在人類支配的環境裏尋找空隙，爭取一份存活的空間，”<sup>⑭</sup>活出了自己自由生命的精彩，作為實現了自我獨特生命價值的生命的主體，他們的死生更像是歷代英雄人物一樣具有傳奇色彩。

#### 1. 天涯無處不是家

西方很多神話的主題都與貓有關，芭芭拉·漢娜認為，貓的形象在現代人那裏可能意味着憤怒而帶有某種情感，很可能是受到忽視的女性的情感。與狗相比，貓往往會受到更多的折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也可能是由於貓族們具有獨立性和喜好獨立的天性所致，他們輕輕走進屋裏吃東西，然後悄然而去，並不像狗們那樣容易做出退讓，自尊心極強。貓生百態盡現朱天心筆下：

“針針大多時征戰求偶在外，領土非常廣，闊及數個山坡新舊社區，往往外出十來天才抽空返家療傷修養。”（《獵人們》，頁25.）

“納納從小就不近大貓，也不理狗族。白日不回家，在我們與後鄰超市之間的綠帶隙地遊蕩，晚上喊回來吃晚飯又掉頭走人不見蹤影。”（《獵人們》，頁33.）

“麻瓜非常獨立，野性十足，並不與其它貓族廝混，也不給人抱，總總非常滿足我多年來想有只老虎而不可得的夢想。我偏偏老不慎就愛上這樣的貓，毫無例外。”（《獵人們》，頁53.）

“我喂他（李家寶，論者注）牛奶替他生火取暖擦身子，他只一意的走到屋外去，那時外面下着冷雨，他便坐在冰濕的雨地裏，任我怎樣

<sup>⑫</sup> 朱天心，《獵人們》，156。

<sup>⑬</sup> 朱天心，《獵人們》，160。

<sup>⑭</sup> 錢永祥，〈序〉，《獵人們》，7。

喚他他都恍若未聞。”（《獵人們》，頁101。）

不論是納納、麻瓜，還是李家寶、貓王針針，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生存的獨立性。在無垠的曠野上遊蕩，對他們而言，人類算是哪一族類呢？

貓族也可能把我們從正軌引入歧途，拋棄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係，而變得和那只埃塞俄比亞貓一樣，處於完全自我放任自流的境地，但是他們也可以像那只“穿靴子的貓”<sup>⑯</sup>那樣，“泰芙奴特”離開了她的主人天帝和日神，自行其事，化作一隻埃塞俄比亞貓單獨出遠門，最後在奴比斯住了下來，<sup>⑰</sup>這樣的傳說至少給我們傳達出這樣的資訊：貓的天性是完全依賴自己而非依賴他人，這可以說是其獨立性的最高表現。

## 2. “他人即地獄”的戒備心

上文論及貓的馴化性，也許還需要時間，不過更有可能是其本性使然，因為與狗不同，貓是一種對人敬而遠之的動物，他並不完全屈從於我們也不完全和我們生活在一起。<sup>⑯</sup>貓的情緒往往也會讓人臉色陰沉、憤憤不平，因為貓族們從不妥協，所以非常容易惹惱別人。<sup>⑰</sup>朱天心也寫出了貓對人心存戒備的一面，“他人即地獄”的心態表露無遺：

卷二  
五

對小薩斯，“如何昵稱，如何餵食，如何照護，都沒用，她與貓族大哥大姊處得十分良好，對狗族是敬而遠之，對人族則充滿戒備懷疑。”（《獵人們》，頁140。）

“薩斯媽媽半點沒被我們感動，而且她嚴禁小貓對我們有感情，所以儘管每天晚上八點左右他們母子仨早等在校園夜暗的角落，見了我們老遠飛奔迎上，兩隻小的，小猩猩、小貝斯已經被我們喂得好大了，但被媽媽教得極嚴格，一面不忘發出‘赫、赫’的噴氣威嚇聲，同時刻的

<sup>⑯</sup> “穿靴子的貓”是格林童話裏的著名故事，說的是一個窮人家裏的貓，穿上靴子後幫助主人變為伯爵的故事。在這個童話裏，這只貓代表的是一隻超級貓，它把極度的機靈聰明與人的觀點結合到一起，表現出一種神聖的東西。

<sup>⑰</sup> 芭芭拉·漢娜，《貓、狗、馬》，127。

<sup>⑯</sup> 也有許多寵物學家說，小動物對人戒備心強，比如貓，可能在它們的眼裏，人類的身體過於龐大，無形中是一種壓迫和威脅，就如同我們站在高個子面前感到壓抑一樣，而大動物相對好些，比如狗。同樣是狗，大狗對人友善，而小狗則充滿戒備，此說不知是否可信。

<sup>⑰</sup> 芭芭拉·漢娜，《貓、狗、馬》，119-121。

肢體語言是愛悅幸福的打直尾巴、四腳輪替踩踏着，言行不一，莫此為甚。”（《獵人們》，頁142.）

貓對待生活是隨遇而安並且能夠對之冷靜對待的典範，從自身尋求欲望滿足的生活態度看，以“穿靴子的貓”為最好的例子。貓的本能使他能夠進入任何地方，人為的阻礙根本阻擋不了他，貓也能夠去到我們可能難以找到任何通路的地方。<sup>⑨</sup>當貓感到舒適愜意時，會顯現出同樣愜意的情緒，這時他可能會在你身邊輕鬆愉快地低聲說點什麼，不過究竟在什麼時候會變臉而伸出貓爪，實在讓人難以琢磨和意料。

### 3. 聰明善良可敬的貓族

芭芭拉·漢娜也承認，母貓是一種很有母性的動物，她們會為自己的小貓找到隱蔽之處，主要是由於小貓的父親公貓要是找到它們，便會將小貓吃掉。不僅如此，母貓還會仔細照看她們的孩子並精心教育他們。像上文引出的“薩斯媽媽半點沒被我們感動，而且她嚴禁小貓對我們有感情”，“向來沒有半點表情的阿麻卻立時跳到我和小貓們之間，對我揮爪怒斥恐嚇，邊抽空回頭搗兩個小的一人一巴掌”，薩斯、阿麻的舉動既體現了貓族對人類的警惕、戒備、設防，也更讓我們感動於貓媽媽們母愛的真實、深切。更有趣的是，還有一些例子可以表現母貓母性的可靠的，例如母貓會收養小狗、幼狐、小兔子、野兔、松鼠、大老鼠，甚至小耗子。<sup>⑩</sup>在朱天心的筆下，母貓們是如此的可愛、可敬：

“公貓和母貓對人類的感情非常不同。公貓無論年紀通常一旦確認你對他是無害的，甚至是不可以提供他食宿的，就把整個身體交給你，絕不遜於一個男子在盛年愛戀時對你所做的；母貓族則可能是必須養育後代的強烈責任感使她顯得保守謹慎多了，她時時刻刻暗暗替你打分數，並相對釋出等量的信任和感情，……要說真正的好獵人，絕對是須撫育餵養貓仔仔的母貓們。”（《獵人們》，頁31-32）

對那些可憐的流浪貓，朱天心充滿同情和關愛，她義正言辭地說：“我們家若是小小的流浪動物之家，也是給那些肯定沒人要、叫不出名號的貓咪

<sup>⑨</sup> 芭芭拉·漢娜，《貓、狗、馬》，135-136。

<sup>⑩</sup> 芭芭拉·漢娜，《貓、狗、馬》，110-111。

狗狗待的”<sup>②</sup>。考慮到她的寫作實際，她並沒有寫出芭芭拉·漢娜在圖1中揭示的貓的各個方面，比如她很少涉及貓的極為虛偽、懶惰、狡猾的一面，那些流浪貓無助的眼神就這麼閃一下，已經把朱天心徹底俘虜了，心醉神迷，引為同類，她哪裏還會去想貓的否定性的一面？所以在朱天心筆下，她寫出了他們的惹人喜愛：嬌媚、多情、冷峻、幽雅，哪怕是涉及貓生的窘迫、艱難、殘酷與偏執，也柔柔的難以讓人生厭生恨。<sup>③</sup>因為“老靈魂”以那雙極富生態學意味的清冽之眼發現了人族與貓族的平等，看到了非人類的生命色彩。

在文明程度如此之高的現代都市，人族能夠遇見不被繩索奴役的自由的貓生們其實是一種幸福，因為這種相逢是野性與文明性的相遇，它挑戰了人類族群極不靈敏的官能感知。人類需要耐心傾聽自然界中被邊緣化了的生命之聲，只有如此，人類與非人類之間才能展開對話、交流、博弈，才能與貓族交換一些生命路途上的生存心得，激起彼此的想像與感觸，喚醒心裏某些被遺忘的情愫與喟歎。<sup>④</sup>朱天心滿心希望，竭盡所能地讓流浪成貓們幸福一些，寬慰一些；讓小奶貓們不至於在自然和人類的威脅中來不及長大就死去。而每每看到養尊處優的寵物貓們在陌生人面前能毫無顧忌地攤開肚皮邀人撓騷時，她又惆悵了。一邊是流落街頭遭人厭棄時有被政府“處理”危險的野貓，一邊是被視若珍寶卻天性全無的家貓。朱天心年復一年地躊躇着，躊躇間所能做的只有讓自家收養的流浪貓們擁有溫飽，與人族享有平等的自由。同時面對人族嫌棄流浪貓噁心之聲，朱天心也不時反問：“他們都沒嫌人族佔盡便宜佔盡資源，我們倒如何嫌他們僅僅只是‘礙眼’？”<sup>⑤</sup>

## （二）特立獨行的獵人意識

每只貓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完整的“貓生”。對都市裏的這些流浪貓，“我心存感激，感激這些如此狂野獨行的獵人們，願意不時與我暫處同

② 朱天心，《獵人們》，66。

③ 錢永祥，〈序〉，《獵人們》，7。

④ 吳忻怡，〈成為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41（2008），1-58；唐小兵，〈《古都》·廢墟·桃花源外〉，收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0），391-402。

⑤ 朱天心，《獵人們》，112。

一個屋簷下。”<sup>⑩</sup>每只貓又是那麼的不同，人類應當尊重與善待他們，但不要多加干涉，這是朱天心在書中苦口婆心想說的話。貓的寄居，完全變成了對朱天心的一份莫大恩賜。在她的眼裏，貓是一群獨立自在的主體，<sup>⑪</sup>從朱天心對待貓狗的態度，我們知道她是善良的，她的行為是道德的，因為如何和動物相處的倫理，決定了人如何和自己相處。

《獵人們》一書的書寫動因與朱天心的其他小說一樣，同樣是以“吶喊”（魯迅語）的姿態呈現。“吶喊”是知識分子處於“邊緣”位置與主流保持距離時的一種批判態度，它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質疑、否定並解構與顛覆。<sup>⑫</sup>甚至，有些“潔癖”的人將他們視為病菌體，聲稱其破壞了城市環境，把人類偽裝成城市生態危機的受害者，而去採取捕殺等極端的措施，這些都是因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形態的偏差而造成地球生物之間不協和的狀態。具有生態意識的“朱天心們”不得不再一次“吶喊”，用文字記錄城市流浪貓們真實的生命存在處境，告慰在一線工作的“貓天使”（定點、定時餵養流浪貓的人族）們，而且在生活中朱天心也身體力行，為城市的流浪貓們四處奔波，組織職工活動，親身參與“TNR行動”<sup>⑬</sup>。

在《獵人們》中，朱天心一改以往的書寫風格，用一顆滾燙的心記錄下了一則又一則的貓族英雄傳記，為貓而哭，為貓而笑，既是朱天心的書寫也是帶給讀者的感動。而作品最為動人之處是文字間的貓生們都具有自我的主體性，他們不再是與人類相對的二元存在體，弱小的“他者”，而是有自己的發聲方式，有自己生命風景的個體。正如張大春形容朱天心時所說：“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可能遠大過於一個寫小說的匠人的角色。”<sup>⑭</sup>對“不喜歡貓和不了解貓的人”的吶喊，警示着地球生物圈內進化階梯上提升最高的生物——人類，對於維護自然在整體上的和諧、完善、完美承擔更多的責任與

<sup>⑩</sup> 朱天心，《獵人們》，67。

<sup>⑪</sup> 錢永祥，〈序〉，《獵人們》，7。

<sup>⑫</sup> 有的人認為，知識分子存在的核心價值就是這個群體具有徹底的批判精神，缺乏批判，該群體就失去了存在的社會根基，而所謂的“知道分子”則完全背離了知識分子的價值觀。

<sup>⑬</sup> 即“trap”（捕捉），“neuter”（結紮），“return”（放回原處），算是對流浪貓狗暫時的舉措。

<sup>⑭</sup> 陳韋臻，《真相與生命的總量——專訪作家朱天心》，<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714734>。

義務，而不應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已經顯得很不正當的利益去隨意地控制、改造、剽掠、宰割大自然，而應該常懷敬畏之心。“敬畏生命的倫理促使任何人，關懷他周圍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運，給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幫助。”<sup>⑩</sup>此外，“人不應把自己當做動物的主人，而是動物的兄弟的思想，不可能一直置之不理。”<sup>⑪</sup>

朱天心對動物的態度與史懷澤（Albert Schweitzer，又譯施韋澤）的呼籲相呼應，推崇人與動物的平等。“我就抱小雙雙到院子裏看花，小雙雙是單單在我畢業典禮那天生的一個漂亮的小姑娘……我把她認作我的小外甥女，奴奴是我哥哥，單單是我妹妹，奴奴是小雙雙的舅舅。”<sup>⑫</sup>（論者註：奴奴和單單是朱家裏最受寵的兩隻狗。）以一顆平等如待人類的心觀照貓族的時候，貓族在朱天心的心裏就是“獵人”。他們獨立、戒備、聰明、善良，是母貓為了教孩子生存技能而把他們從樹上推下時的樣子，那種住在高層公寓裏，衣食無憂、對人類依偎撒嬌的寵物貓們絕非朱天心深情關注的物件。獵人們的生存狀態，映襯出了人類的冷酷與緘默，所以朱天心希望以“貓天使”們的努力，給那些倒楣的流浪貓們一點關乎與人類相處的“溫暖的、和善”的記憶，同時也期望把自己的心“養得軟軟的、燙燙的、火紅的”<sup>⑬</sup>。養有“軟軟的、燙燙的、火紅的”心或許是朱天心思考彌補人類與非人類相處時人類自身缺陷的一劑良藥。

其實，不僅在《獵人們》裏，朱天心的其他文章裏動物們的身影也不時出現，例如因護嬰而搞得神經敏感的“袋鼠族”們，如求偶期公孔雀般的盛年人類（《我的朋友阿里薩》），如“老靈魂”在《古都》、《匈牙利之水》等尋鄉之旅過程中所顯露出的異於人族而接近動物族的靈敏神經，還如《想我的眷村的兄弟們》中將不被認同的“異鄉人”比作“徘徊於鳥類獸類之間，無可歸屬的蝙蝠”，凡此種種，朱天心都以動物作筆，表現了人類與地球其它生物主體之間的生態維繫，為生存於現代都市中的人類找到了生命

<sup>⑩</sup> [法]阿爾貝特·史懷澤，《敬畏生命》，陳澤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26-27。

<sup>⑪</sup> 阿爾貝特·史懷澤，《敬畏生命》，109。

<sup>⑫</sup> 朱天心，《擊壤歌·日月光華且兮復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15。

<sup>⑬</sup> 朱天心，《獵人們》，61。

征程中“註定既親密又疏離”<sup>④</sup>的伴侶。<sup>⑤</sup>

獵人意識的出現與強化，除了客觀上生態危機的嚴峻態勢之外，也符合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自身的寫作邏輯和觀察視野，她把視野擴展到被壓抑的非人類個體，呼籲人類放下傲慢的姿態，在這個世界中，特別是一個生態世界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去擠壓他（它）族的生存空間，讓貓族與人族都能找到展示自己生命厚度與純度的舞臺。<sup>⑥</sup>正如朱天心自己所說：“但是一個不肯給非我族類一口飯、一口水、一條活路的國家，作為人族的我們生存在其中，究竟有什麼快樂、有什麼光彩、有什麼了不起可言？”<sup>⑦</sup>甚至以貓族的口氣開玩笑地質問，難道“是因為我們沒有象人族一樣花錢買房子並交管理費所以就沒有生存權嗎？”<sup>⑧</sup>

#### 四、“獵人們”：貓族隱喻的意義通達

##### （一）“老靈魂”的流浪生態

自然生態環境因人類中心主義持有者的權利控制而被毀壞，同時，人類自身也出現了精神生態的病症，似乎外在與內心都出現了問題。朱天心銘記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她焦慮不安的身影與其是說對迷失故園的緊張焦躁，不如說是未來的殷切企盼和擔憂。<sup>⑨</sup>

從眷村走出的每一個外省人都想念眷村。如《古都》，一開頭朱天心即以追憶似水年華般的感慨、感傷與留戀一連用了七個“那時候”回憶往昔眷

<sup>④</sup> 朱天心，《獵人們》，44。

<sup>⑤</sup> 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臺灣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仲介臺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1997），114-139；呂正惠，〈怎麼樣的後現代？——評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281-285。

<sup>⑥</sup> 劉亮雅，〈九十年代女性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6），163-195；呂正惠，〈不由自主的小說家——論朱天心的四篇政治小說〉，《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269-279。

<sup>⑦</sup> 朱天心，《獵人們》，167。

<sup>⑧</sup> 朱天心，《獵人們》，215。

<sup>⑨</sup> 《古都》描寫的尋鄉之旅，看似是對過往的深切懷念和對現代都市的否定，其實，主人公又無時無刻不再牽掛自己的女兒，想像着這個巨變的現代化都會在以“女兒”這一形象為代表的人類心上留下怎樣的溫暖風景和故土家園。

村生活的種種：“那時候的天空藍多了；那時候的人們非常單純天真；那時候的樹特別高大特別綠；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那時候鮮有公共場所；那時候夏天夜晚通常都看到銀河和流星；那時候的背景音樂是披頭四。”<sup>⑩</sup>但隨20世紀80年代後眷村的漸漸消失，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費的現代都市的迅速崛起，曾生活於眷村的人們靈魂如何才能歸依，焦躁不安、漂泊不定的心靈又如何才能安放？

生於文學世家的朱天心，在眷村中的童年生境給她帶來了無限的溫暖與慰藉，當動盪的社會政治時局和冷漠的現代都市人類，不斷地質問這位致力於成為上帝的異鄉人是否認同臺灣本土時，她遭遇了思想上的困惑，在漂泊的弱小群落之中再一次成長發育。<sup>⑪</sup>她翻閱典籍，披上“老靈魂”的裝束，開始漫長的尋鄉之旅。隨之而來的是永遠的陌生、失落、尋覓、迷失、痛哭、哀悼，這場註定無家可歸的回歸之旅妄圖調整人與自然在時間之間的錯位，尋找彌補過往與現代斷裂的樞紐，這種不惜跨越時空找尋失落的故鄉的漫漶腳步具有生態學的意味，“‘回歸’實際上是端正人的生存態度，發掘人的生存智慧，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糾正人在天地間被錯置的位置。‘回歸’是參照‘原點’為現代重新提供一個行走的基礎，借着這個基礎，我們能在技術世界內而又不受它損害地存在着”。<sup>⑫</sup>但當“老靈魂”踏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現代都市時，卻有置身於曠野廢墟之感，過去所熟悉的一切消失不見了，故鄉只能是遙遠記憶裏的存在物。<sup>⑬</sup>“老靈魂”在《古都》中的漫漶、焦慮，讓我們洞察了生態危機四伏的單一化的、無歷史的現代都市景象，發現了地域文化特質的遺失和生態危機。

<sup>⑩</sup> 朱天心，《古都》（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275。

<sup>⑪</sup> 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25（2009）：179-204；黃凱珺，〈論《荒人手記》、《沉默之島》、《行道天涯》的國族認同書寫〉，《第三屆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253-281。

<sup>⑫</sup> 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37。

<sup>⑬</sup> 林唯莉，〈尋找君父的城邦——試論《逆旅》、《漫遊者》中女性自傳式書寫與家國尋索〉，《第二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343-376；邱彥彬，〈恆常與無常：論朱天心《古都》中的空間、身體與政治經濟學〉，《中外文學》35.4（2006）：57-94。

## (二) 源於貓族的隱喻

當猜測流浪的小貓們遭遇人族無情黑手時，朱天心們憤怒了，“人族世界常有的險惡之事從沒教我失志絕望過，為什麼此刻我一丁點的力氣也使不上，我只能當場化身为狼，引頸對天嚎出我的憤怒和無法流出的淚水。”<sup>④</sup>甚至在她看來，善待貓生乃經國之大業，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人們對待流浪動物的態度是比衡量國民生產總值更重要的指標。

在這個趨於單一化的現代都市裏，朱天心竭力展開保存其生物多樣性的活動，在《獵人們》中她用“關懷”、“尊重”和“吶喊”之筆讓城市的弱勢種群活出獨屬自己本族的生命色彩，完全解構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寵物”觀，在後現代的思想框架中構建了人族與貓族之間的關係。正如錢永祥在《獵人們》的序中總結的那樣，“朱天心與貓族的關係，乃是‘相逢’而不是‘佔有’。”<sup>⑤</sup>佔有是宰製，相逢是仍能持續地珍惜、付出，不至流於冷漠、寡情。“朱天心對貓族的態度，最好是用‘關懷’與‘尊重’來形容。其實，關懷與尊重，正是我們對待其他人、乃至於對待動物的基本原則。”<sup>⑥</sup>在這種“相逢”而非“佔有”的健康生態關係中，不僅拯救了流離在城市街頭的貓族，而且還喚醒了人族滾燙的生命情感，為治療都市生態失衡現狀和精神生態危機開出了一道良方。研究者們這樣評論朱天心：作家身份背後，是一個更熱烈的公民朱天心，憤怒是她的寫作動力，以文學做赤子之心的吶喊。在這個生態危機趨於嚴重的時代，她在文字和行動之間自覺履行着都市生態人的神聖職責。

貓與人能夠有多大的區別？朱天心筆下的貓其實就是其自身，貓是流浪的，朱天心們也是流浪的，這些貓完全帶有“朱天心們”的特質，如同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即如果“A=C，B=C”，那麼“A=C”。圖示如下：

<sup>④</sup> 朱天心，《獵人們》，186。

<sup>⑤</sup> 錢永祥，〈序〉，《獵人們》，7。

<sup>⑥</sup> 錢永祥，〈序〉，《獵人們》，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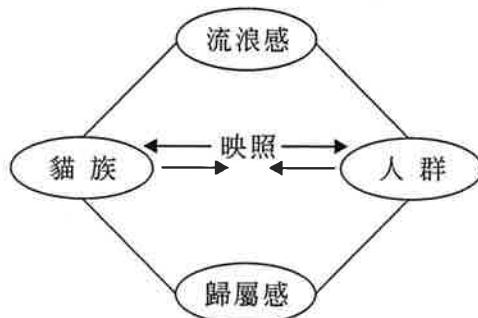


圖2：貓族隱喻的內在關聯

圖2中顯示，人處於無根的流浪狀態，無家可歸，人的生態位元系統中的身份尷尬與曖昧與生俱來，永遠處於尋找歸屬感的狀態；同樣的，在人的意識中，貓也是流浪，無家可歸的，所以人與貓無異。那麼，貓的生態位就類似於人的生態位。貓的百態就是人的百態。寫貓，當然就是寫人，貓生和人生，自然成為一體，緊緊擁抱一隻貓的命運，就如同擁抱個人的命運。

以往的許多生態文學作品都是 $1+1$ （生態十文學）＝2（生態文學）的機械式的組裝，二者簡單而粗糙的縫合，是生態文學遭人詬病的最大原因，朱天心似乎已經跨越了這一層次，而實現了生態與文學的溶解。<sup>⑭</sup>貓族是人類流浪感的投射，這點有助於我們解讀他們出現在朱天心作品裏對作者的意義以及作者的心理狀態。貓很少成群結隊，獨往獨來而又自主，這就是朱天心的心理狀態？是對尷尬身份的無奈還是其他？在朱天心的主動想像中貓族如何影響了她？這已經類似蝴蝶與莊周的關係了。那些帶着孩子參加各種培訓班的家長們，路遇流浪貓，抱怨並告誡孩子們“髒死了趕快走！”，冷眼旁觀甚至和孩子一道或用石頭或用彈弓攻擊或用開水燙流浪貓們。朱天心責問他們是不是想過，自己一手教育出來的孩子，這種對動物的欺侮，甚至會延伸到越來越年邁、弱勢的自己，因為從他們對待動物的態度，總能看出對待同類的態度。

當然，這種交流，貌似是與外在的貓族之間的交流，實際上也是與靈魂

<sup>⑭</sup> 陳仲義，《中國前沿詩歌聚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252。

中的人類自我進行對話。<sup>④</sup> “貓人”，就是對人的一種隱喻通達，其中，流浪的貓族成為投射的源域，流浪的人群成為投射的目標域。那麼，“獵人們”究竟是貓還是人？還就是貓頭人身的合成體？通過關聯，我們獲得了投射進人類本能中的那種自力更生的能力。<sup>⑤</sup>可以看出，貓族所代表的是一種獨立自主而且幾乎是狂野的本能，這種本能與朱天心們內在的獵人意識十分接近。

## 五、結語

正如芭芭拉·漢娜所言，就每個人對我們身上的貓性態度來說，“穿靴子的貓”賦予我們很可寶貴的啟示，我們無法改變這種本性，但是我們可以使他們穿上靴子，使他們具有一種超脫的和個性化的傾向。那只“穿靴子的貓”表現出來的機敏與精明，的確是更為直接地來自于榮格在《共時性》裏稱為“絕對智慧”的東西，而比較少地來自於一般的人的意識。<sup>⑥</sup>

這非常類同於朱天心所謂的“老靈魂”氣質<sup>⑦</sup>，她在《預知死亡紀事》裏對“老靈魂”氣質做過概括，“他們是那些經歷了幾世輪回，但不知怎麼忘了喝孟婆湯的人，他們通常因比他人積累了幾世的智慧經驗（當然，也包括死亡和痛苦）”，“這些老靈魂，一定有過死亡的記憶，不然如何對死亡如此如此知之甚詳，心生恐懼與焦慮”。“老靈魂”本也是西方占星家的詞彙，現在成了這個群體的稱謂，他們似乎能夠自由穿行於死生之間，完全具有某種“巫術”的意味，同樣的，貓也幾乎與魔法與巫術緊密關聯着，位於美國波士頓近郊，充滿神秘感的小鎮 Salem，那滿街遍佈的黑貓的造型可見一斑，《哈利波特》以及很多童話故事裏的黑貓大多也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sup>④</sup> 參見 Geoffrey N·Leech & Michael H·Short ·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1 ) , 31.

<sup>⑤</sup> 關聯性可以看成是從輸入到認知過程中的話語、思想、記憶、行為、聲音、情景、氣味等的一種特性。參見 Dan Sperber & Deirdre Wilson ·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 2<sup>nd</sup> edition ) (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1 ) , F27.

<sup>⑥</sup> 榮格的論述引自《榮格文集》卷8，此處皆轉引自芭芭拉·漢娜，《貓、狗、馬》，136。

<sup>⑦</sup> “老靈魂”語出《預知死亡紀事》，從這篇小說開始，“老靈魂”才成為朱天心小說的中心人物。參見朱天心，〈預知死亡紀事〉，《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2）。

通達死生之界。

其實“老靈魂”們離我們根本不遠，他們“可能是同機鄰座緣慳數小時的某小公司負責人”，“也可能是你妻子，母親，以及那些熟悉得早讓你失去了好奇和興趣的親人好友”<sup>⑫</sup>，近得我們艱於呼吸，他們充滿了對於現實生活的細密的關注，他們憂生憂死，甚至有點杞人憂天，他們斤斤計較於生活中最為瑣碎的事件，當他們意識到自身的無能為力時感到了深沉而又絕望的痛苦，但他們卻又從未放棄努力。不過，他們的呼號與哭喊，卻一如屈原的“九歌”，試圖運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啟智他人。<sup>⑬</sup>

“我只但願，同樣作為地球上的過客，我們彼此容忍，互不斷生路，至於生死禍福，自己碰自己擔，這，會是一個太奢侈的夢想嗎？”<sup>⑭</sup>朱天心疑問着，期盼着，我們也疑問着，期盼着……，同時也期盼着社會公民的知識分子的朱天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出於道德的、倫理的生命叩問。

(沈玲 廈門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方環海 廈門 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sup>⑫</sup> 朱天心，《獵人們》，162。

<sup>⑬</sup> 評論家王德威曾說：“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對時間、記憶與歷史的不斷反思，而她老靈魂式的角色成為啟動此一反思行為的最佳媒介。老靈魂年不滿半百，心懷千歲之憂。他（她）們知道太平盛世其實隱藏着無數劫毀的契機，也驚訝在生死大劫之前，凡夫俗子竟能活得如此渾然無知覺。”參見王德威，〈老靈魂的前世今生〉，《讀書》6（1999）：10。

<sup>⑭</sup> 朱天心，《獵人們》，219。